

蘇維埃國家與國際法

引 言

蘇聯 柯熱夫尼柯夫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五年 北京

引言

國際法是歷史上形成的並隨時變化着的行爲規則（協定的與習慣的規範）的總合，這些行爲規則爲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調整各國平時及戰時在政治、經濟和其他方面的鬥爭與合作關係。

現代文明的國際法並不是一下子就確定下來的。它是國家間進行鬥爭與合作的長期歷史過程的產物。現代國際法上的某些概念（例如大使的不可侵犯權，宣戰）都起源於遠古，即封建時期以前（一），另一些概念（例如仲裁法庭，國際社會機關）則在封建時期已經常常接觸到（二）。

但是大部分國際法原則的形成，是與封建制度解體、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時期相聯系的。

在從封建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期，產生了商品貨幣關係更加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世界貿易聯系擴大起來了。正在形成中的大的民族國家組成體爲爭取貿易上和政治上的優勢而進行的鬥爭劇烈起來了，而這些民族國家的組成體，也是建立浸透着國家利益與國際合作觀念的新的政治思想體系的先決條件（三）。必須以法權來調整這些國家間的政治和其他關係的問題就產生了。

在這些客觀的歷史因素的基礎上，對於國際法上各項基本概念與主要制度的發展有着決定意義的創造性影響的，就是世界各國先進的各族人民，而俄羅斯人民在其中佔居顯著的地位。

在制定國際法個別原則與規範方面，俄羅斯在過去就常常走在其他許多國家的前面，從而對於公

認的現代文明與進步的世界文化寶庫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四〕。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的俄羅斯，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偉大的蘇聯。

本書的主要任務也就在於闡述蘇維埃國家對國際法所採取的態度，並說明它在國際法的發展上所起的卓越的創造性作用（即只是從這方面舉出某些例子來說明）。

換句話說，本書的任務並不是要來研究蘇維埃國家對於所有毫無例外的具體的國際法制度所抱的態度，也不是要來詳細分析蘇維埃國家對於整個國際法體系的发展所發生的影響。

專門研究蘇維埃國際法學（就蘇維埃學者對國際法上的一般問題和特殊問題所敘述的各項原則的體系來說）的發展史，也不在本書範圍之內。對於蘇聯的國際法著作，我們只順便提一下，而不去全面地批判地研究個別著作和分析個別作者的全部法律觀點。

但是即使作了這些聲明，我們還是十分了解完成所提出的這項任務的艱鉅性，因為在兩個世界即社會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共處的條件下，國際關係具有一種獨特的性質。由於有了這個因素，對於適用於蘇維埃國家（它正處於複雜的各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的任何國際法權問題的提法和解決，絕對不能採取千篇一律的態度，是更加明顯了。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將世界分成兩部分——社會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關係，就是目前整個世界歷史上的主要問題。這兩個世界間的鬥爭與合作，構成了整個現代生活的軸心，補充了新舊兩個社會的活動家當前所實行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全部內容〔五〕。

蘇聯是處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內。關於這一點，烏·伊·列寧曾經說過：「我們不僅在一個

國家裏生活着，而且是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內生活着，而蘇維埃共和國之與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其最後結局，不是這個獲得勝利，便是那個獲得勝利。」〔六〕

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向各國人民昭示出，資本主義時代快告終結，帝國主義者立腳的基地已在動搖，任憑他們再怎樣拚命掙扎，也挽救不了資本主義臨近着的末日〔七〕。但是，當我們還不得不考慮有這種國家體系存在的時候，它的存在對於正確了解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在國際法上所採取的立場，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列寧和斯大林曾經給資本主義包圍的體系下了經典式的定義。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說道：『資本主義的包圍——這就是說，有一個國家，即蘇聯，在自己境內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此外還有許多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繼續着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並包圍着蘇聯，正在等待時機，以便進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要毀損它的威力並削弱它。』〔八〕

必須記住，進行資本主義包圍的反動分子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仇視是採取了極其多樣的方式來表現的，而在資本主義矛盾急劇尖銳化的時候，這種仇視也特別加深起來。

這一原理直到目前，即在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被擊潰以後，還沒有失去它的意義，雖然在從前的意義上的那種統一的『資本主義包圍』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這種包圍現在已不可能實行了，即使大不列顛和美國堅合衆國的統治集團還打算這樣做〔九〕。其所以不能實行這種『資本主義包圍』，首先是因為人民民主制度已在我們許多鄰國中取得勝利，這種制度自然會努力進一步鞏固與自己的救星和朋友——偉大的蘇聯——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聯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了資本主義體系一個新的打擊，更加動搖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陣地，大戰後產生了人民民主國家，它們在本國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下進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民主改革：消滅地主階級並將土地交給農民，把大工業和銀行收歸國有等等〔10〕。

資本主義包圍已經不像它戰前的樣子了，但它的頗大部分還繼續存在着〔11〕。

維·米·莫洛托夫說道：『當我們還生活在「國家體系」內，並且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還沒有最終剷除的時候，我們對於新的可能破壞和平者的警惕性不應當減弱，而對於鞏固各愛好和平國家的合作之關懷，像從前一樣，將是我們極其重要的職責。』〔12〕

斯大林同志指出：『當我們在開展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片刻也不應該忘記正在醞釀着新戰爭計劃的國際反動派的陰謀。』〔13〕

需要牢牢記住，戰後的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政治力量劇烈地重新劃分了，形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和以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作爲基礎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14〕。

由於大部分資本主義包圍仍然存在，加之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體系中有着國際反動派分子，所以就產生了兩個原則性問題：一個是蘇聯國內情況方面的問題，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係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如此複雜的外部包圍的條件下，在蘇聯是否可能完全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呢？是，可能。列寧和斯大林的意見使我們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懷疑。

例如，大家知道，在『星期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亞力山大·惠爾斯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書面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問題中，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是可能的嗎？』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在一個國家中實行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在像蘇聯這樣的國家中。』（一九）

蘇聯具有將這一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一切條件。並且蘇聯人民正滿懷信心地向着共產主義社會前進（二六）。

必須將在完全保障資產階級關係不再復辟的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問題（這一問題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能解決）跟蘇聯國內關係方面的問題區分開。

斯大林同志指出：『第二個問題只有通過國際無產階級之嚴重努力與整個我們蘇維埃人民更嚴重努力相配合的方式才可解決。』（二七）

由此產生了與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在國際法方面所採取的立場直接有關的一系列重要的任務。

例如因此就產生了進一步加強蘇聯勞動者與其他各國勞動階級之間的合作的嚴重任務。必須牢記約·維·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指示：蘇聯在自己的對外政策上，所依靠的特別是『切身需要保持和平的世界各國勞動者底精神援助』（二八）。

正如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指出的，黨在對外政策方面的任務之一，是『鞏固我們與需要國際和平友善的世界各國勞動者間的國際友誼聯系』（二九）。此外，堅決不懈地揭露力圖用和平主義的詞藻來掩蔽帝國主義的真正強盜本質，從而造成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分化並

毒害他們的意識的法、英、意等國右翼社會黨人的背叛政策，也是黨在當前的主要任務〔二〇〕。

由於國際反動派的惡毒陰謀，即使在粉碎了希特勒德國與帝國主義日本之後，蘇聯的國防能力問題仍舊保有它頭等重要的意義。

必須牢記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即使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第三階段，武裝保護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蘇聯陸軍、海軍以及爲捉拿懲罰外國偵探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兇手、叛徒所必需的懲罰機關與偵探機關也是仍然保存着。

約·維·斯大林說過，『必須牢記偉大列寧的指示：在過渡到和平勞動的時候，要永遠保持警惕，保護我們國家的武裝部隊與國防力量就像保護眼珠一樣』〔二一〕，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兩者之間相互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急遽改變〔二二〕。

第二個問題，是由於存在有資本主義包圍這一事實而產生出來的有關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係方面的問題，即兩種敵對的體系之間在原則上是否可能發生某種聯系呢？是的，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間發生某種聯系是絕對可能而且是絕對必要的。

閉關自守的思想與社會主義是絕不相容的。列寧和斯大林的主張以及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在外交和經濟方面多年的經驗，使我們在這一方面毫無任何懷疑。蘇聯與資本主義各國，無論在外交方面、經濟方面和其他方面締結協定，在原則上和實際上都是可能的。

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時指出：兩種對立的體系即

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的存在，並不排斥簽訂這種協定的可能性（二三）。

大家知道，約·維·斯大林對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所提關於蘇聯與西方各民主國家間，雖然存在着思想上的差異，是否可能實行長期友好合作的問題，以及關於兩種體系間是否可以實行『友好的競賽』這一問題，給予了肯定的答覆（二四）。

約·維·斯大林在他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與美國共和黨要人史達森的談話中關於本問題所發表的著名言論，在這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二五）。

由此可見，兩種體系的敵對性並不排斥蘇聯與資本主義各國間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曾屢次指出這種合作的可能性：『我們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系，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侵犯我國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

我們對所有與蘇聯交界的鄰國，都保持和平親近善鄰的關係，只要它們也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而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破壞我們蘇維埃國家疆土完整與安全利益的時候，我們是始終都保持這個立場的。』（二六）

在法西斯主義和世界侵略勢力的基本策源地被粉碎和消滅以後，世界各國人民的政治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國人民的民主運動獲得了廣泛的發展。

因此，我國與那些本國人民羣衆已經掌握了自己國家的命運並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的各國間的合作和善鄰關係，從愛好人類和平而反對反動勢力、反對新的世界大戰的挑撥者而進行的積極鬥爭來

看，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和特別重要的意義。

安·日丹諾夫指出：「蘇聯外交政策，就是堅持與一切願意合作的國家保持善鄰關係的方針。對於那些與蘇聯真正友好的同盟國家，蘇聯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始終是它們忠實的朋友和鄰國。蘇聯的外交政策就是要繼續擴大對於這些國家友誼的幫助。」〔二七〕

同時應當着重指出：蘇聯與這些國家間進行合作與建立善鄰關係的可能性，應以平等互惠原則作為基礎。任何想要單方面解決與蘇聯關係上的某一外交問題的企圖，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隨時會遭到蘇聯政府最堅決的反對。

從這一觀點來看，英國政府（已商得法國政府的同意）在一九三九年，英法與蘇聯之間關於建立有效的和平戰綫的談判中所持的立場，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它表明了已經遭到破產的，想使蘇聯陷於比英法不利的地位的企圖。

蘇聯政府當時之不能同意英國政府把軍事責任片面地加在蘇聯身上的「反提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合作應以其自然的基礎——互惠原則——作為先決條件〔二八〕。在這方面還應該指出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外長會議上三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關於，比方說，德國賠款問題所持的片面態度。凡是在沒有互惠原則的場合，就不可能建立起蘇聯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間真正的合作。

如果直接談到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關係，那末，和我們打交道的這些國家之承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平等原則，乃是可以建立這些關係的不可動搖的條件，因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每一民族都擁護他們所願意和能夠擁護的制度。」〔二九〕

蘇聯對於兩種所有制即資本主義所有制與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平等原則的理解，就是不許在各國間的相互關係上採取任何形式的經濟侵略。蘇維埃政府從社會主義革命剛一開始的時候起就屢次提出了這一原則，並使它獲得了法律上的承認。

在有蘇維埃政府代表參加的第一次國際會議——一九二二年的熱那亞會議（III）——上，蘇聯代表除提出其他一些問題以外，並極其堅決地提出了承認兩種所有制平等的問題。

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熱那亞會議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上，蘇維埃代表曾以其政府的名義提出了這樣一項原則性的聲明：在使新舊兩種社會制度可以並存的當前的歷史時代裏，爲了普遍的經濟復興，代表這兩種所有制的各國間的經濟合作，乃是絕對必需的，因此蘇維埃政府極其重視關於相互承認各國目前現存的不同所有制和不同政治、經濟制度的加納決議案第一項（III）。

這一問題曾經在一九二七年的世界經濟會議上再次提出，並且得到了肯定的解決。在這次會議的決議中特別指出：恢復世界貿易和完全制止對於政治方面的任何干涉是可能的，全體與會國家的代表「儘管經濟制度有所不同」，而參加這次會議，應當被認爲是各國之間的和平貿易合作的預兆（III）。

審查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日蘇聯所提關於經濟上互不侵犯公約草案的專門委員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確認了兩種所有制平等的原則（III）。

但資本主義各國違反了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的決議案和上述專門委員會關於承認兩種所有制正式平等的決議，不僅沒有停止在經濟方面反對蘇聯的鬥爭，甚至還在日益加緊這一鬥爭。因此，一向忠於自己反對任何侵略形式這一原則的蘇聯政府，爲了國際和平的利益，又於一九三三年將經濟上

互不侵犯的協定草案，提交倫敦經濟會議討論。

雖然這一草案也像其他許多草案一樣，遭到了葬身於國聯委員會的迷宮之中的命運，但是蘇聯之提出這一問題，其本身就是具有很大的原則性意義的。

確立兩種所有制平等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原則上和實際上的意義（三四）。這種思想的確立特別是意味着資本主義世界無條件承認作爲「蘇維埃政府的政綱不可動搖的基礎」（三五）之一的國家對外貿易壟斷制。

關於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間可以建立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問題、以及關於簽訂這些協定的一般條件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

這些協定的限度如何呢？『這些協定的限度是由兩個互相競賽和鬥爭的體系的對立性來規定的。

在這兩個體系所容許的範圍內，而且只有在這種範圍內，簽訂協定才是完全可能的。』（三六）

在兩個體系即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共處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法方面所採取的一般態度又是怎樣呢？

首先必須着重指出：蘇維埃國家對於國際法所抱的態度，是有一定的規律性的，而這種規律性所由產生的根源，是在於我們整個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本性。在我國由偉大的『斯大林憲法』提到空前高度的法制思想所由產生的根源，也在於我們制度的本性。蘇聯對國際法所抱的態度就是將法律穩固性這一總的斯大林原則適用於蘇聯國際關係方面的實際表現。

其次，應該注意，蘇維埃國家在國際法方面所抱的態度，是與它的對外政策密切聯系着的，而按

照列寧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三九〕。

在國家的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和某種相互依存性。列寧教導說：「將對外政策從一般政策中分離出去，或者甚至將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對立起來，都是根本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的。」〔三八〕並且，列寧和斯大林不僅確定了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的統一性，而且還指出了對外政策是以對內政策作為基礎的。

蘇聯已進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並由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

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指出：「第三個五年計劃是適應於我們已經進入的這一新時期的。它適應於這一情況，就是蘇聯已進入發展的新階段，進入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並由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三九〕

大家知道，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所通過的關於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的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的法律，「重新恢復了由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確定但因希特勒德國背信侵犯蘇聯而暫時中斷了的蘇聯社會的發展道路，這一道路規定要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並逐步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它規定要解決蘇聯經濟上的基本任務——在經濟方面，即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工業生產量方面，趕上並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四〇〕。

由此可見，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蘇聯對內政策的總任務，是偉大的列寧、斯大林的黨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初期就向我國勞動人民提出了的任務。

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期，蘇聯和平對外政策的一切基本原則，便確定下來了（四一）；這些原則是以不朽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作為基礎，而且所有這些原則都服從於保證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和平條件的總任務。

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它的對內政策自然的繼續。事實上，蘇聯的對外政策與這一情況完全適合，即蘇聯國內已經沒有人剝削人和一個階級奴役另一階級的現象，而是由真正的民主、民族自由和平等原則佔據着統治地位，所以它的對外政策的目的便是：維護國際和平，捍衛蘇維埃國家的自由和獨立，援助為掙脫外國的奴役，為爭取完全恢復民族自由與國家獨立而鬥爭的被侵略國。

但是當我們談到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繼續時，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與任何剝削社會的國家的對外政策之間所存在的深刻的原則性的區別。

任何一個剝削社會的國家的對外政策通常反映着和維護着少數剝削者的狹隘的利益（四二）。

而蘇聯為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而進行的鬥爭，是有助於世界各國勞動人民和全體先進與進步人類的鬥爭。因此，保證建成共產主義的和平環境的蘇聯對外政策担负着深刻的國際主義的任務。

維·米·莫洛托夫曾經指出：蘇聯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不僅符合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我們盟國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人類的利益，如果實際上真正考慮到其他各國的人民羣衆，而撇開帝國主義各國的一小撮統治者的話』（四三）。

莫洛托夫同志強調指出，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考驗之後，渴望安全與持久和平『已是全世界不分男女的普通人民所懷抱的最隱秘的感情』（四四）。

但是，決不能從列寧斯大林關於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統一的學說中得出將二者等同的結論。換句話說，如果經常而絕對地把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從具體內容上等同起來，那就是完全不科學的。

蘇維埃國家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根本的歷史任務是要在蘇聯建成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蘇維埃國家在對外政策方面也力圖改變它周圍各國的社會制度。

約·維·斯大林在與霍瓦爾德的著名的談話中曾經指出：『倘若你以為蘇聯人想要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用武力去改變周圍國家的面貌，那你就大錯了。蘇聯人當然願意周圍國家的面貌改變，但這不是周圍國家自己的事情。』〔四五〕

關於這一重要問題，我們在聯系到肯定蘇維埃國家對國際法上的不干涉理論所抱的態度時還要談到。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曾經說過：『蘇聯底對外政策是明白而顯然的。』〔四六〕

我們的目的是明白的，就是在蘇聯建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我們的對外政策——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服從於這一任務。我們的目的和任務對於我國和全世界最廣大的勞動羣衆來說是很明白的。並且因為這些原則是以不朽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作為基礎，因為它們是由社會主義制度的本性中產生出來的，並且是在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來實現的，所以它們是始終不變的、經常一貫的。

對於資本主義各國的對外政策當然決不能這樣說。

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常常是被一層不可捉摸的烟幕掩蓋着。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一切存在至今的統治者及其外交家的技巧和活動」，其目的都是「唆使人民互相傾軋，利用一個民族壓迫另一民族，藉以保障君主專制政權的繼續存在」（四七）。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要號召工人階級自己來「精通國際政治的秘術」，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來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地揭露它，努力達到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照的那種簡單的道義和正義的法則，成為國際關係上至高無上的法則」——其原因就在這裏。

「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分。」（四八）

上述種種，現在應用於各侵略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也完全沒有失去它的意義。

這就是烏·伊·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致邵武勉的著名電報中之所以要他「學會外交」的緣故（四九）。約·維·斯大林也這樣要求。蘇聯外交當局一貫遵循着這種要求，慎重地研究外國過去和現在的外交。約·維·斯大林對於「……有時勝過前綫兩三個軍團」的蘇聯外交的功績作過很高的評價。

綜上所述，應當認為：現今各國愛好和平人民的外交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組織「反對新戰爭宣傳者的廣泛的反宣傳、和主張保衛和平的宣傳，使新戰爭宣傳者的一切言論，都將受到輿論和出版界應有的回擊，從而及時地揭露戰爭挑撥者，使他們不可能濫用言論自由來反對和平的利益」

必須揭露當前主要由軍事政治的諜報人員及其在文職官員中的少數支持者所進行的關於「新戰爭」的叫囂，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他們之所以需要這種叫囂，其目的至少是爲要：「（甲）以戰爭的幻影來恫嚇他們的締約當事國的某些天真的政客，從而幫助本國政府從這些締約當事國獲取更多的讓步；（乙）使本國軍事預算在某一時期內難以縮減；（丙）延緩軍隊的復員，藉以防止國內失業人數的激增。」〔五一〕

必須揭露並制裁新戰爭的挑撥者（當前，首先是邱吉爾及其在英國和美國的同夥就是這類人物），因爲他們目前形成了對世界和平最嚴重的威脅〔五二〕。同時還必須注意到：現在在帝國主義者發動新戰爭的願望與組織這種戰爭的可能性之間，還存在着極大的距離。全世界人民都不要戰爭。安·安·日丹諾夫在這方面着重指出了下面的情況：「擁護和平的力量是如此的強大，只要這些力量在保衛和平的事業上能堅定不移，剛毅沉着，那末侵略者的計劃就一定會遭到完全的失敗。」〔五三〕

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內與對外政策是完全統一的。並且蘇聯的對外政策符合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本性，它的特點，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是始終不變和經常一貫的。

對於資本主義各國的對外政策却不能這樣說。內在的經濟上的矛盾，大多數國家政治體系內部的不穩定性，統治形式的更替，不間斷的階級鬥爭，政府的時常垮台和改組（每一政府往往奉行着與前一政府相反的政策）——所有這些情況不但造成了對外政策上的矛盾，有時甚至還造成了同一國家在某一時期內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的矛盾。

在某一具體時期內，某一政府的對外政策，從該國的利益來看，可能是具有進步性的，而它的對

內政策却是反動的。也有與此相反的情況。甚至時常有這種情形：某一國家在同一時期內，對於對外政策的某一問題，採取比較進步或比較不反動的立場，而對於同一政策的另一問題，却採取比較不進步或比較反動的立場。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無常以及在對外政策內部發生某些變化，在歷史上都是可能的。

蘇聯是作為國際法權關係中的特殊的獨立的主體，作為世界政治的創造性因素而出現於國際舞台的。蘇聯從來不使本國的對外政策去遷就任何其他國家的對外政策（甚至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常常這樣做）〔五四〕。社會主義國家過去從來沒有，今後也永遠不會追隨任何外國的對外政策。蘇聯對外政策的特點還在於絕對的獨立性。蘇聯執行着自己的對外政策原則而出現於國際舞台，並且始終一貫地執行着這些原則。獨立性和原則性是列寧斯大林對外政策的特點。

約·維·斯大林說過：『無論過去或現在，我們都是抱定依靠蘇聯自己，並且只是依靠蘇聯自己的方針。』〔五五〕

維·米·莫洛托夫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常會上所宣讀的通知中說道：『蘇聯現在和將來都要執行它本國的以蘇聯各族人民的利益，而且僅僅以這種利益作為依據的獨立的政策這一點難道還不易了解嗎？』〔五六〕。

斯大林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和原則性，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及戰爭結束以後，具有特殊的意義。例如舉世皆知的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上，在一九四六年的巴黎和會上，在外長會